

## 書 評

何 維 剛\*

Zeb Raft 雷之波

### ***The Threshold: The Rhetoric of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***

Cambridge MA: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23, 282 pages.

ISBN 9780674291379

### 一、前 言

當我們所處的世界，從單極世界轉向二極甚至多極世界，此是否亦影響讀者看待世界、甚至歷史與文本的方式？雷之波（Zeb Raft）《戶限：中古中國歷史書寫的修辭》（*The Threshold: The Rhetoric of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*）一書，甫獲得 2024 年中央研究院「第十三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」。作為一本討論中古歷史書寫與史學修辭的專著，主軸固然環繞於《宋書》文本的細緻分析，但是觀照歷史書寫的切入點，如何游移於建構與解構之間、內在與外顯之間、真實與偏見之間，書名《戶限》所揭示的中間地帶或臨界狀態，或許更能展現作者獨到的學術眼光及當代關懷。

---

2025 年 3 月 27 日收稿，2025 年 7 月 15 日修訂完成，2025 年 8 月 8 日通過刊登。

\*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。

Ho Wei-kang, Assistant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,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.

政治模型的內外架構與歷史書寫的修辭藝術，是貫穿全書的兩個核心觀念。內外架構由東漢政權的內廷與外朝概念延伸而來，「內在性」(“interiority”)指涉進入歷史與權力中心的人物形象，「外在性」(“exteriority”)則指形像被邊緣化的歷史過程，意味歷史書寫同時受到內部權力與外在邊緣的拉扯。因此歷史並非是單純對於過去的記錄，書寫本身就是歷史行為的一部分，與其將正史視作不可偏移的權威，不如回歸到文獻性質與製作過程，更可反映當時的意識形態。而其中的關竅，便是修辭。《戶限》一書的修辭觀念，並非侷限於文辭的修飾行為，而是一種「修辭行動」：修辭是塑造歷史的工具，透過協調「內在性」與「外在性」兩種書寫的正反形象，進而生成我們所見的歷史。換言之，歷史並非客觀事實，而是被修辭化為不同的敘述模式，歷史文本即是修辭的產物。

本書除了引言與結論外，共分為五章：第一章〈內在性〉(“Interiority”)、第二章〈外在性〉(“Exteriority”)、第三章〈官場論述〉(“An Essay in Officialdom”)、第四章〈史學的自我塑造：朝廷辯論的修辭〉(“Historiographical Self-Fashioning: The Rhetoric of a Court Debate”)、第五章〈歷史進程〉(“The Historical Process”)。其中第一、二章是一個整體，環繞於劉宋開國功臣劉穆之的正反形象加以展開，關鍵的核心問題是：「歷史」並非絕對，書寫的褒與貶都會影響到歷史形象與話語權。然而決定褒貶者，不僅是史官，同時也是傳主劉穆之與政壇對手。

《宋書》〈劉穆之傳〉是「內在性」修辭的代表案例，從其生涯的起點，便已充滿絕對的權力光環。劉裕與劉穆之的君臣際會，使二人成為權力的一體兩面，劉穆之不僅是作出正確判斷的軍師，更是襯托主君正統的陪襯角色。劉裕與劉穆之皆非完人，劉裕字拙、劉穆之貪利，但是在「內在性」的修辭策略下，劉裕字拙的粗野氣質可以與漢高祖劉邦共鳴，而劉穆之貪利則呼應著家境貧寒與謙遜的自我察覺，並同時展現了真性情。劉穆之是「內外修辭」的高手，即使在不利的情况，也可將政治情勢甚至是歷史書寫化貶為褒，將困境導向內在性的勝利。

在《宋書》本傳，劉穆之擁有修辭主導權，但在權力地位與影響力被世家大族取代後，劉穆之及其子孫在政治與歷史上逐漸被邊緣化，此則為

第二章〈外在性〉所欲討論的焦點。〈王弘傳〉稱劉穆之的死亡是出於「愧懼」，而《宋書》將劉穆之與漢臣荀彧連類對比，既框架了劉穆之的角色類型意義，也暗示著劉穆之即將步上荀彧後塵。正如同劉穆之擅長將困境轉向勝利，世家大族也透過褒中帶貶的「荀彧模式」對付劉穆之，愈張揚其生前榮耀，愈能坐實愧懼而死的不堪。這種修辭操作的痕跡，尤其表現於《宋書》對劉穆之子孫的描寫。劉式之貪利、劉瑀背義，此與其說是歷史事實，不如說是歷史修辭。劉穆之將貪利的缺點化為謙遜，世家大族則將缺點放大傳播，都是修辭行為的一種。另一方面，劉穆之於「外在性」的負面形象，同時也成全了劉裕政權的「內在性」。寒門出身的劉穆之，正是高門大族出身華胄卻毫無才幹的對比，劉穆之不僅代替劉裕吸收了世家的仇視，同時也達到連結雙方的橋樑作用。相對於記錄事實，歷史書寫更近於一種政治操作，同樣的事件可依照不同語境與立場重新定義，褒（內在性）與貶（外在性）並非史家慧眼，而是在歷史行動、書寫、傳播時便已註定。

第三章〈官場論述〉以過往學界較少關注的角度「官場升遷語詞」切入，闡釋升遷語詞的使用並非事實記錄，而是一種修辭結構，箇中蘊含了特定的歷史意識形態。官僚體系是皇權國家與世族政治的協商場域，而官職的授予及接受，則牽涉到國家與私人的權力互動。該章以《宋書》〈徐羨之傳〉為例，將徐羨之的官職升遷詞彙分為兩大類：「以為、除、辟、徵」等具有強烈的國家主體意識，「為、拜、起、不就」則展現了傳主私人的主體性。中古世族不能脫離官僚體系，卻又可憑藉家族勢力暫時脫離官場，這種若即若離的中間狀態（即書名《戶限》），豐富了升遷詞彙的多樣性與價值意涵。修辭行動是高超的政治藝術，庾炳之的性格缺陷成為政敵的修辭論點，張邵則透過自我「外在化」的修辭展現忠誠。讀者無法判斷歷史事實與軼事傳說的界線，與其將史書視作實錄，不如視作當時人們透過操作修辭，建構出適合當下政治需求的歷史敘述。

第四章〈史學的自我塑造：朝廷辯論的修辭〉，則聚焦於《宋書》〈王弘傳〉中的廷議記錄，探討史書編纂如何透過文體「議」來形塑人物形象，並且當時人物如何利用修辭操控廷議記錄，將部分人物獲得歷史「內

在性」，其他則被邊緣化。廷議主軸有兩個方面：一是同伍犯法士族是否需要連坐；二是士族犯罪的懲罰問題，核心關鍵是士族政治與皇權國家的主從認識。議論的進行本身便是一種修辭結構，議題不僅承接前者言論，也為接下來的發言鋪路。論辯主題從士族是否應受到國家法律規範、國家不應干涉士族、強化士族的絕對性、以道德價值取代士族論述框架，最終則以王弘強調士族應受國家規範總結。「議」作為文體的重要性在於：議論動機發端於解決當下的問題，論者透過對於過去的議論，結果將會影響近期（劉宋）與遠期（廿一世紀）讀者的未來，甚至重塑了讀者對於歷史的認識。各種人物試圖影響自己的歷史記錄，此為標題「自我塑造」之意，亦為王弘試圖透過廷議塑造自身形象的寫照。但最終成功與否仍取決於撰史者的框架，史書以一種微妙的批評總結王弘生平，說明試圖操控歷史僅是枉然。

第五章〈歷史進程〉作為全書最後一個章節，頗有總結全書論證之意。《宋書》的「書」有多種意涵，既是指涉史書，也可以是各種歷史「文書」的匯集。歷史書寫為國家公領域及史官私領域的交涉空間，然而正史的絕對權威性，卻可能出於史官的家族經驗或私人偏見，事實上，六朝史書往往出自私人著述而非國家計畫。國家的單一聲道以及文書的多聲複調，構築了如今的歷史面貌，真實的歷史可能根本不存在。本章特別強調歷史編纂的「未完成性」，歷史書寫沒有絕對答案，而是一個進程，即使是出自特定立場完成的歷史著作，也可能受到他人刪改挪用而成為價值截然不同的觀點。與其盲目地將歷史視作靜態定論，不如回到中古文獻的編纂過程，在表層的歷史事件下更加深入探索文本的偏見與生成，或許更能接近所謂歷史的真實。

「誇示性歷史」作為全書結論，意指歷史並非實錄，而是透過褒貶來塑造社會價值。褒貶是中國歷史書寫的核心關懷，但是褒貶並非單純的道德批判，而是一種修辭操作。頌揚人物的同時，承認了該人物在當世的正當性，即使對某些人物有所批評，也未必是針對該人物的行為性格。以批評襯托頌揚，進而使核心價值更加明確，可能也是歷史批評的修辭策略。本書的學術成就之一在於突破了正史的權威性。不論是內在性與外在性的

拉扯，或是史書編纂過程中文書的地位，在在說明歷史人物形象的建構是多層次聲音的融會，不能僅關注歷史記錄的表面事實，而更要理解歷史生成背後的修辭策略。

《戶限》一書前此已有 Pearce Scott 與王冠淇所作二篇書評，<sup>1</sup>或許二位書評作者出身優秀的史學訓練，相關質問偏重於歷史詮釋的商榷，較少關注該書的文學研究面向。實際上，本書雖然跨足文史，但本質上仍屬於文學研究。從寫本文化到歷史想像，《戶限》承繼作者雷之波文學觀察的一貫脈絡，核心關懷在於：沒有事物是永遠穩定而不可變動。文學研究的要旨，除了去蕪存菁，更在於探問「蕪」所以產生的意義與目的，此皆呼應本書對於修辭行動、文本生成以及立場偏見的重視。何謂「文學」？此一問題放在不同世界將會有各樣解答，如若放在臺灣的漢學研究脈絡，作者於文學研究方面的創發尚有二點值得關注。

其一是對於六朝文學研究視野的拓展。臺灣的六朝文學研究，向來有偏重詩賦抒情文類的傾向。本書專注於《宋書》文本的討論，頗有跳脫文學經典框架，轉向思考文本生成之意，進而從書寫與閱讀的雙重角度，重新省視何謂「文學」。此尤其見於第三章「官場升遷語詞」以及第四章於「議」的文體研究。前者提醒讀者：六朝時期國家與私人的拉鋸，可能充斥於任何書寫之中，作者亦受此意識形態影響，未必能明確掌握箇中差異。就後者而言，《文心雕龍》有〈論說〉、〈議對〉，各別因應不同的使用場合。寫作是否應考量既定的文體規範？相對於文體的應然與實然，或許更應思考議論之主持、安排、順序，是否參雜了主辦者或史官的修辭行為？六朝時期絕大多數的應用文類收錄於史書或類書，《戶限》對於文本真實的省思，其實適用於各種文體研究，且應認真加以對待。

其二是修辭研究的想像。臺灣的修辭研究主流是「狹義修辭」，將修辭獨立於文法、章法等領域以外，反映著學術分工專業化的特徵，缺點則

---

1 前此書評可參看 Pearce Scott, review of *The Threshold: The Rhetoric of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*, by Zeb Raft, *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 144, no. 1 (January 2024): 185-90; 王冠淇, 〈文史之間：評 Zeb Raft, *The Threshold: The Rhetoric of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*〉, 《史原》36(2024.09): 77-94。

是偏重於文辭與辭格辨析，研究難以施展身手。本書書名《戶限：中古中國歷史書寫的修辭》，其修辭概念不僅是文字、文辭、文章等語言文字藝術的修飾，更進一步延伸至「修辭行動」。修辭既是表達，更是塑造歷史的工具，歷史人物的行動、政敵的傳播、史官的收集刪選、甚至對於過往歷史的否定，皆可視為修辭的一部分。換言之，人類身上流淌近於血液與靈魂者，其實是文字。若沒有文字，則沒有歷史，也就不會有人的存在。修辭研究不僅是文辭及語辭的研究，而是人類的研究。

本書自然存在一些商榷空間。文本生成是本書討論的重點，但就六朝時期的實際文本狀況而言，除了正史、類書與少部分零星材料外，基本上已難以重構文本生成的脈絡與環節。舉例來說，正史傳記的生成很大程度上可能依賴於私家行狀，那麼在劉穆之、徐羨之、王弘傳記的探討上，如何判斷文辭觀點是出自本家行狀、政敵軼聞還是史官史筆？第三章對於「官場升遷語詞」的探討，無疑是本書亮點，但若以國家／私人劃分主語，新觀點與舊學術的對話應該如何加以展開。考量到本書的預設讀者以歐美漢學學者為主，文獻引用多經英譯，各類升遷語詞隨著時代演變而語義會有所層疊，在不同語境是否具有不同的詮釋空間？此外，南朝的官職選舉往往存在選用次序。《南齊書》〈百官志〉稱「肇域官品，區別階資」，南朝官制與魏晉、隋唐的差異，便在於士族的「階」與「資」。仕宦的升遷與語詞使用，除了是國家與私人的兩造磨合，是否亦有可能蘊含著內在的秩序結構？這些疑慮未必是本書寫作的問題，但讀者在閱讀此書時，仍可持之扣問。將討論範圍限制於《宋書》與劉宋時代，是本書升遷語詞與官場文化相互論證的重要前提。筆者不禁聯想，若能將北朝墓誌的升遷語詞作一統合觀察，其得出的結論與本書會有何異同？此則有待於更進一步的研究。

不過，六朝文獻的瓶頸並非本書專有的問題，而是六朝文學研究者共有的問題。《戶限》優秀的地方仍在於觀察角度與品味深度，能夠在前人無所疑的地方有所疑，已見作者慧眼所在。南北朝史家的正史著作，僅有范曄《後漢書》、沈約《宋書》、蕭子顯《南齊書》、魏收《魏書》，即使是時代相隔最近的《南齊書》，編纂風格亦迥異於《宋書》。唐代以後，政治

與社會結構產生變異，史書亦漸從私家著述轉向官方修纂。《宋書》的「文書」編纂性質與其他中古史書不同，《戶限》所處理的課題，諸如政治修辭行動的內外游移、皇權與士族中介的官場論述、議論文體的史家預設與推導，前提建立於六朝士族政治社會的語境。本書在閱讀方法與文本思考上，確實提供了嶄新的觀點與學術成就，在中古史傳、志怪、地志、軍記等材料，歷史書寫與修辭行動的意義皆能有所共鳴啟發。若跳出六朝士族社會，本書於閱讀與思考的啟發或許亦適用於不同時代，但在文獻考證與理論基礎上，讀者仍須留意本書環繞於中古時代的特殊性質。

作為一本學術專著，本書對於讀者有相當要求，除了需要具備劉宋文學的基礎知識，也需不斷探索作者術語的意義與界線。《戶限》一書的構思與撰寫，固然受到臺灣漢學的影響，但主要的預設讀者族群，仍在於歐美漢學學界，尤其是追求六朝文學與史學跨域研究的學者。因此本書的長處，並非文本細讀與文獻考證，而在於閱讀與思考方法的激盪。不論是東亞或歐美漢學，六朝文史研究發展至今，許多既有議題漸趨飽和。如何突破學科僵局，以更高層次的思考取向——如文本生成、歷史詮釋與修辭行動——融會傳統並打開新的研究可能，《戶限》一書的研究成果，或許更容易得到跨領域學者的青眼。此外，本書作者雷之波的研究興趣，從中古詩歌研究、寫本研究到歷史書寫研究，代表著從文本、文獻的考察轉向到文本生成的關懷，並以「修辭」融會文本、文獻、生成三者。修辭策略不僅適用於史傳生成，亦刺激讀者重新思考中古「文本」的意義，既解構了解讀的權威，更以修辭角度跳脫六朝美文與抒情的框架，在六朝文史研究的學術傳承與研究深化上俱有意義。

對於《戶限》一書的認同或是批評，或許也是「修辭行動」的一環。我們都活在自己的「歷史行動」之中，這篇書評或許也將成為「歷史書寫」的一部分，只是形象是正面或負面，則非作者自身所能決定了。

